

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

刘贵福

内容提要 抗战中期,以华北摩擦和皖南事变为标志,国共矛盾激化。但在此一阶段,国共双方军队在战场上仍给予对方一定的配合。中共发动百团大战有打破日本进攻西北计划、影响全国战局和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战略意图。在百团大战中,国民党晋南部队给予八路军以一定的配合。在中条山战役中,中共军队也应国民党请求,在敌后出击,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这种配合反映出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历史事实。但由于国共间的矛盾,在这两场战役中,国共双方彼此都没有给对方以最大的支持。这是一场全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中,也不是一件没有遗憾的事情。

关键词 共产党 国民党 百团大战 中条山战役 配合作战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关系比较和谐,在战场上也进行了许多密切的配合。但1939年后,国共双方在华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在华中地区,1941年则发生了皖南事变。双方在局部地区兵戎相见,统一战线几近破裂。那么,在这一矛盾激化时期,国共双方是如何对待合作抗日的,具体实践又是怎样?本文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对这一时期的国共合作抗战情况进行讨论。

一 百团大战的发动与国民党方面的配合

百团大战发生在华北国共两党军队激烈摩擦之后。从发动的原因上看,它与国民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0年,日本受德国在欧洲战场取胜的刺激,企图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然后南进。为此,日本加大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强度。6月,日本打破其“不扩大占领地”的作战方针,攻占长江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宜昌,并对重庆展开大规模空袭。同时,为切断海外援华通道,日本又对英、法施加压力,要求关闭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同意关闭滇越铁路,英国则同意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至此,中国战时海外交通只剩西北一途。7月27日,日本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纲要》,提出要适应世界形势,“集中政略、战略之综合力量处理中国事变,特别是断绝第三国之援蒋活动等,尽一切手段使重庆政权屈服”。^①按此方针,在加强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的同时,日本又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工作。

宜昌陷落,引起国民党的极大震动。英法军队在欧洲的迅速失败及在东亚地区的撤退,更使中国的抗战陷入孤立的境地。滇缅公路关闭后,大后方物价迅速上升。对于1940年的形势,中共当时做出如下判断:“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

^① 何理等选编:《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

投降危险快到来。”^①中共认为：“国民党在国际局势激变后，已发生抗战与投降两派斗争，前者是主张亲苏和共及政治改良，后者则主张反苏剿共及政治倒退。”^②百团大战的组织与发动就是建立在这些判断基础之上。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③无论当时中共对国民党投降危机的判断是否完全准确，但通过发动一场大的战役来影响战局和政治形势，则的确是发动百团大战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出发点。

中共选择此一时机来发动百团大战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在华北国共摩擦之后，中共试图通过大规模的主动出击来缓和国民党的指责，加强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对中共的指责中，除所谓中共不遵守“军令”、“政令”外，最重要也是最有蛊惑力的一条就是说中共“游而不击”，“专打友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除了积极在政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编《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② 中央关于国共谈判情况致彭德怀等电，1940年8月12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451页。另外，在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出席讲话，对形势做出如下判断：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③ 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15页。

治上调整国共关系外,在军事上,则选择了击敌和友的战略。在百团大战发动后的9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指示》,提出“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具体则是:“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的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即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力量,而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①对于击敌和友这一战略初衷,彭德怀晚年在身处困境的条件下仍然不予否认,他在《自述》中说:“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②

1940年8月22日,朱德、彭德怀向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发出养电,通报了百团大战的目的及兵力部署。8月27日,八路军总部首次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报告了百团大战的发动目的、兵力部署及初期战果,并提请国民党“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进展”。^③国民党方面对百团大战予迅速反应。^④晋南卫立煌部二十七军一部向高平附近各据点之敌围攻,攻占据点多处,第五集团军向横关岭一带,第四集团军向夏县及张

① 《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13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③ 叶剑英转报八路军百团大战兵力部署及战绩电,《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148页。

④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于26日、28日连电朱德,9月4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给对八路军百团大战以赞扬。

茅大道一带之敌进袭,破坏公路多段,九十三军破坏队在临汾附近炸毁敌南开火车并毙敌百余。^①9月6日,卫立煌制定了“配合百团大战的攻击部署”。^②同时,蒋介石也下达了“以十八集团军百团大战为法则,加强游击战的训令”^③,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根据蒋的指示,于9月16日制定了“策应百团大战之作战部署”。^④

按照既定部署,在晋南的卫立煌部于11日发起攻击。据熊斌关于第二战区策应百团大战战况致蒋介石电:1.文日(12日—引者注,下同)我二七军主力向晋城猛攻,于元日(13日)曾一度攻入城内。又于东日(1日)百官村(晋城东北)之敌被该军歼灭过半。2.第九军连日猛攻博晋公路沿线之敌,并以有力部队由天井关突破公路,向晋城以西南袭攻中。3.长(治)高(平)之敌真子(11日午夜)经我九三军猛攻窜入城内,并袭破太义镇(高平东北)敌粮弹车五十余辆。4.第十师于文(12日)夜已将阳城西南近郊外围各据点攻占。5.十五军于文夜攻占西三涧后,刻正与敌在郇王(降县东北)附近激战中。6.张茅沿线之敌被我第四集团军不断派队袭击破坏,并以另一部进出水头镇至运城间,企图截断同蒲路及威胁安运之敌飞机场。^⑤晋南国民党军队的配合行动持续到25日。

① 军令部关于晋南各部与八路军猛攻敌之战报,1940年8月。《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27页。

② 卫立煌关于配合百团大战攻击部署电令,《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31页。

③ 卫立煌转达蒋介石关于以十八集团军百团大战为法则加强游击战训令,1940年9月7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32页。

④ 阎锡山奉令策应百团大战之作战部署致蒋介石电,《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36页。

⑤ 熊斌关于二战区部队策应百团大战作战战况致蒋介石等电,1940年9月22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41页。

27日,蒋介石下令晋南晋西停止攻击,原因是八路军第一阶段攻击正太路的战斗已经结束,故不需单独作战。^①

国民党的配合,无疑是对百团大战的支持。但国民党对待百团大战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抗日是国共合作的基点,并且,国民党此时也判断日军有进攻洛阳、西安、郑州的企图,中共百团出击可谓是对正面战场的极大支援,因此,国民党予以一定配合是自然的事情。^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又不愿意八路军通过抗战而发展壮大,也不愿意通过抗战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虽然华北摩擦后,国共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局部妥协,但国民党对中共力量壮大的恐惧却不仅没有因此消除,反而加剧了。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拟具方案,试图限制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于旧黄河河道以北狭小地区,7月,以《中央提示案》的形式将此案通知中共,并于10月19日向中共发出类似最后通牒的皓电,军令部还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在这种背景下,显而易见,国民党不可能全面配合八路军作战。^③所以,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的配合是有局限的。从时间上看,配合极为短暂,从地域上看,则仅限于晋南。就连在五原的傅作义也出乎日军意料地

-
- ① 蒋介石令晋南、晋西部队停止攻击致阎锡山电,1940年9月27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43页。
- ② 卫立煌在祝贺百团大战胜利致朱德电(1940年8月26日)中就指出八路军此时出击的意义:“查顽寇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事以迎头痛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深佩服。”国民党军令部也判断日军有欲进攻西安、洛阳、郑州的企图。见《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24页,245页。
- ③ 不惟如此,国民党对百团大战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也极不情愿。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蒋介石就指示中宣部:“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如十九日新华日报所载:晋西通讯社即载此事,此项名词及相关之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希即饬遵。”见国民党中宣部抄发蒋介石电令绝对查禁有关“百团大战”文字的密函(1940年10月20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47页。

毫无动作,使日军从容地从该地区调集军队来参加“扫荡”八路军的察南作战。^①在山东地区,国民党不仅没有配合八路军作战,相反,为限制中共军队进入华中,在百团大战期间对八路军仍不断进行摩擦,致使八路军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无法执行百团大战第二期计划。^②

二 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国民党军队的配合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华北地区的日军。可以说,在击敌方面,百团大战成绩卓著,但在和友方面却未达到目的。在百团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正当中共中央还想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抗国民党新的反共活动时^③,皖南事变发生了。国共关系随之迅速下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统一战线处于破裂边缘。正当国共矛盾激化时,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在日军进攻面前,国共合作抗战,双方关系也渐渐走出低谷。

中条山位于晋南豫北之交,横亘黄河北岸,东接太行,西连吕梁,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潼洛,是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日本此前曾多次进攻却未能得逞。百团大战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从各地兵团至各军、方面军都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中,改变了原来对中共的看法”^④,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报

① 《百团大战史料》,第433页。

② 叶剑英转报八路军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部署电,1940年9月30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41页。

③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1940年12月22日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14页。

④ 《百团大战史料》,第440页。

复性扫荡。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长期牵制日军 3 个师团，且在百团大战中出击日军配合八路军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经反复研究认为应“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① 在充分准备后，日军于 1941 年 5 月 7 日发动了中条山战役。

大敌之前，国民党要求中共配合作战。5 月 10、11 日，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刘斐和蒋介石分别约见在重庆的周恩来，亲自表达其希望八路军配合作战的愿望。^② 在中共得到国民党请求后，5 月 8 日，政治局会议，同意配合作战。^③ 并“迭电前方配合作战”。^④ 5 月 9 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⑤ 5 月 14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按寻常状态作战）。”^⑥ 同日，毛泽东同朱德再电彭德怀，针对日军欲渡黄河，提出：“我军于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2 分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33 页。

② 见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1941 年 5 月 10 日），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1 年 5 月 11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5、107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第 294 页。

④ 关于华北我军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等问题的指示（1941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 103 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中），第 295 页。

⑥ 《毛泽东年谱》（中），第 296 页。另可参见关于华北地区我军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等问题的指示（1941 年 5 月 14 日毛泽东致敬周恩来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 104 页。

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① 彭德怀随即致电薄一波、牛佩琮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晋南敌正围攻中条山友军，并在飞机掩护下强渡黄河未成，沿途民众恐慌，西安粮价猛涨，人心惶惶。应以一个团兵力破击洪洞北同蒲线。新一旅以一个团进袭安阳汤阴间平汉线，以加强国民党作战决心。^②

5月16日，彭德怀制定了《关于配合国民党军对进攻中原之敌的作战部署》，提出：“为提高与坚定国民党作战决心，兴奋民众，扩大我之政治影响，除由一二九师决死一纵队各以一部兵力在安阳以南之平汉路，洪洞以北之同蒲路各先行破击外，我华北各兵团（除山东部队外）应立即准备于最近期内作一较大规模之行动，配合友军作战。”破击范围包括同蒲路、汾离路、平绥路、正太路、石德路、沧石路、白晋路、邯济线等，并提出除破路外，力求拔除在根据地心腹的敌人据点，并准备反扫荡作战。^③ 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目前的作战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以打得太凶”，“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④ 5月22日，彭德怀根据中央18日指示，令各兵团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南北铁路线发展较大游击战，翻车、破路、断敌交通。于23日在临汾及安阳南对敌灵活进击；如敌向西安前进，应准备较大之战役，配合友军作战。^⑤

关于配合作战情况，据6月9日《解放日报》报道：“一：在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第296页。

②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③ 彭德怀关于配合国民党军对进攻中原之敌作战的部署，1941年5月16日，见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08、509页。

④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50页。

⑤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50、251页。

南,五月七日之夜,八路军配合当地群众七千余人,开始大规模的破击战,截断了敌之联络和交通。二:在白晋线,于五月九日,八路军在子洪口开始伏击敌之汽车,在沁原南北,破坏铁路三里多,从12日起,白晋路已不通车。三:在正太线,五月十六日,八路军攻占获鹿以南之泉火车站、井陘以东微水车站,及寿阳、榆次、苏家庄各车站。四:在同蒲线,五月十五日,在崞县原平间,破坏铁路十余里。十七日破坏大同以南宋家庄至尚家庄间之铁路一段。五:在平汉线:破坏涿鹿以南铁路数段,在保定以北,炸毁敌货车一列。北平热河间,炸敌货车一列,我军曾一度攻占水冶镇汽车站。六:在平绥线,攻占怀来以西之沙城堡车站,破路三里多,在蔚县至张家口间,破坏敌之汽车桥一座。”^①

从毛泽东的电文和后来的实践看,中共对国民党的配合也有所保留。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从客观看,进入1941年后,敌后的条件不允许中共再采取向百团大战那样的大规模进攻作战。百团大战后,日军疯狂报复扫荡,敌后根据地陷入困难之中,这就是毛泽东所担心的“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的原因。在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不得不对其军事政策进行调整。如为坚持冀南平原的斗争,在稍后的6月9日,中共提出:“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使民众不致吃亏……”^② 1941年11月7日,中共又发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

① 《晋南战役的教训》,《解放日报》1941年6月9日。

② 关于冀南平原对敌斗争的指示,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124页。

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①

从主观看,中共对于国民党也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抗战需要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国共间又确乎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从前者说,面临共同的敌人,中共必须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否则无以在中国政坛立足。所以,虽然新四军皖南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于国民党之手,但在国民党仍继续抗日的情况下,中共也必须坚持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方针。这一方针,在中条山战役之后也依然如此。如在1941年6月8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左权提出“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寇将继续进攻,而在东方慕尼黑危险尚未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②

从后者看,进入抗战中期后,由于国民党采取“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国共间发生一系列冲突,使中共不得不加强对国民党的防范和戒备,而皖南事变更是给中共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痛,作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相对于国民党都处于弱势的一方,中共对国民党的防范心理与戒备行为更加重了。中共中央1941年4月

①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212页。

② 中央、军委关于对蒋介石及卫立煌的方针的指示(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74页。

18日发出的政治情报就说明这一问题。情报写道：“在日蒋矛盾尖锐存在，国民党没有投降以前，对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何应钦到西北后，又盛传国民党将进攻边区，我们除多方揭破外，并为必要之预防措施，日来已渐沉寂。惟国民党驱我军出华中之心至今未死，其军事行动亦仍在继续，在西北则屯军数十万，加紧准备训练，对我进攻之威胁亦依然存在，因此我在这两方面提高警惕性与进行各种自卫措施，都是不可少的。”^① 这一在中条山战役前半月所作出的形势判断势必影响到后来的配合作战。毛泽东所担心的如果八路军在前方大打日军而“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显然出于这种防范戒备心理。^②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在百团大战和中条山战役中，国共双方都给予对方以军事上的配合。这种配合反映出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历史事实；这种配合既有军事上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同时也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维持，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保证。同样，由于国共间的矛盾，彼此都没有给对方以最大的支持，也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这在一场全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中，也不是一件没有遗憾的事情。

（作者刘贵福，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中央1941年4月政治情报，194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81页。

② 同样，国民党也戒备着共产党。就在中共发出情报的同一天，何应钦在洛阳召开关于晋南作战的第一次准备会议，在讨论如何应付日军的进攻的同时，还讨论了如何对付中共军队的问题。何应钦判断当日军进攻洛阳、南阳时，中共会乘机谋西安，或向西安北扩展，故提出一、二战区应研究如何应付。见何应钦主持关于晋南会战作战准备之历次会议记录（第一次会议，1941年月18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5页。应该说，大敌当前，这种认识和判断，也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在晋南地区的抗日准备。